

蔣公訪印與印度獨立(下)

● 吳俊才 (總統府國策顧問)

四、以革命奮鬥經驗提供

印度革命領袖

蔣公訪印期間，曾與印度革命領袖甘地晤談，並接見國大黨主席阿沙德，就印度爭取獨立自由之事，交換意見。尼赫魯則以國大黨中常委身分，隨侍蔣公並三次晉謁長談。

照預定計畫，蔣公極盼與甘地會晤，甘地也希望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能見到蔣公伉儷(註一一)。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為此於二月十二日特電蔣公勸阻：「此間內閣同僚均以爲閣下提議在華爾達訪問甘地先生之舉，可能會影響我們集中全印度力量以對抗日本的努力，此舉或會無意中加重當地派系間的歧見，而在此時則全國團結實屬必要，余謹懇求閣下體諒此點，勿堅持與印度總督願望相違之主張。」(註一二)邱吉爾首相不願見中印兩大領袖會晤從而強化兩國間的精神默契與真誠合作，已極明顯，而所持片面理由則爲不容影響印度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實則如能勸服甘地改變印度不參戰的立場，則不僅有助於盟國間有效團結，以贏得對日作戰的勝利，且

亦能促成印度內部的真正團結，故蔣公仍堅持於訪期中會晤甘地。二月十五日再度約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囑爲轉移英國態度，「必可有助於共同作戰」。並囑尼赫魯轉達此意與甘地，「決定排除萬難防與甘地相晤之意。」蔣公爲盟國謀，爲印度計，不惜拂邱吉爾首相之意，而作此堅持，其意志之堅，計慮之週，與態度之誠懇，終於使此一歷史性之會晤，乃能於二月十八日在加爾各答甘地密友比拉(Bir)的寓所得以實現。

蔣公於甘地及阿沙德與尼赫魯的多次會談中，聽取了印度革命領袖爭取獨立自由的決心及有關進行方略的報告，曾一再爲其剴切剖析印度所面臨的外在形勢，並依據我國革命奮鬥的經驗，指出印度所宜採取的途徑，更保證我國決心以具體行動，向盟國力爭界予印度政治實權與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地位。以一位亞洲國家的領袖，本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如此懇切的向歐美列強爲亞洲國家的印度爭自由平等，在近代亞洲政治史上，尙屬罕見，而對甘地諸人所提建議，又皆至情至理，故爲甘地等所深深感動，其重要內容於下：

(一) 提示革命的方法與中印兩國如何合作之道

：「不合作運動用於印度，我並無異議，用於與印度環境相同之地，我也甚贊成，然用在印度之外，就爲另一個問題了。我並不想勸說先生與英國合作或不合作，我所欲與先生研究者爲達到目的之方法」。「我以爲世界人類有欲完全解放，中印兩大民族必先得自由與解放而後可。蓋世界人類，中印兩民族合占其半數，而民族得到自由，世界半數人類已有自由。日本侵略成性，假使希望它來解放東方民族，必重蹈過去的錯誤。自我國唐代而後，數百年來，歷朝均有受日本侵略的史實。而我中印兩國邊界相共者長達三千餘里，交往的歷史有二千多年，惟有文化與經濟的交，絕無互相侵攻的事實，足證我中印兩大民族乃愛好和平的民族。而日本侵略中國後必侵略印度。我認爲印度不能獨立自由，中國也不能獨立自由，而若中印兩大民族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全世界人類亦無自由，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平。我兩大民族苟不能參加此次戰爭，將來即不能參加和平會議，世界真正和平亦無由建立。我此來目的即欲研究我中印兩國如何合作，以求得獨立與自由的方法。

「我們要求自由，必須自己奮鬥，今日爲最

難得的機會，此次苟不參戰，即失去一爭取自由的機會。我相信中印八萬萬人民聯合起來，其力量必足以應付白人而有餘。此次戰爭民主陣線獲得勝利後，中印兩國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收穫，固不可預料，然我中印兩民族在世界上必得一應得之地位，這同時也是我所必爭的真理。我說參戰純係我個人的意見，既不勸說先生參戰，也不勉強國大黨參戰。今我中國業已參戰，即印度始終不參戰，將來和平會議舉行之日，我仍必要求各國允許印度派代表出席。如此議遭週拒絕，我中國必退出和會。蓋因印度於此次戰後如得不到自由，中國參戰即失去了意義，如此即使中國參加戰勝國之列，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我當然希望印度國大黨能改變主張作參戰的決定。如此則將來和會派遣代表一節，資格上可以絕不發生任何問題。但此點我剛才業已表明決不勉強。如和平會議不能予我中印兩國以真正自由，吾人仍有退出和會的餘地。我們中印兩國單獨的聯合起來，再作奮鬥。然而我中印兩國在此時聯合起來積極參戰，於爭取自由之點更無失敗之理，反之若僅中國參戰，而印度袖手旁觀或取中立兩可態度，此不特中印兩民族今日之損失，實是人類解放史中最大之缺陷。

「革命有兩要素，一曰爭取時間，此次戰爭或尚有兩三年之持續，但間或發生新的變動，半載一年即告結束，如此則時勢不再，以後欲再找機會，即甚困難。印度參戰目下即為最好時機。我相信印度參戰對本身有益而無損，且與印度希望推倒英國在印統治權之目的並行而不悖，殊途

同歸，這就是所謂爭取時間的一點。二曰爭取世界同情，爭取世界同情的力量比任何力量為大。印度如欲得此種同情，唯有參戰。現全世界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均同情於印度，然如印度參戰，同情者的數量定必增加，否則必致減少。我此次以中國革命黨員的資格前來與革命黨友人晤談，目的即欲研究如何起來反抗侵略國家之方法，此乃中印兩國求得自由之共同基礎也。」(註一三)

(二)建議先取得自治領地位後獨立：「實行革命有兩種方法，即直接方法和間接方法。所謂直接即武力從事，間接則用政治的方法達到目的。直接方法的目的，為用武力推翻政府。用政治方法雖然不完全採革命手段，也一樣可以達到革命目的。我對於印度覺得用第二種間接方法，以完成志願為有利。易言之，諸位先生進行爭取自由當經若干階段，而採用政治的策略，我以為印度宜用政治方面的計畫，而不用直接方法以達到目的。這樣可使印度加速獲得自由而縮短革命的時問。中國古諺云：『終以迂為直』，我卅年來的革命經驗，深明此語的真理，這就是所謂間接的方法。我不知道印度為了達到革命的目標，其努力能否完全用政治方法，先得到真正的自治領地位，然後獨立。我認為如果政府有妥協可能，似乎可以接受妥協的解決辦法，而先取得自治領地位。我所欲建議的是，印度爭取自由或者可以採取我剛才所說的逐個階段辦法。我覺得世界局勢有如此的變化，印度獲得自由是不成問題的，但請諸先生注意我的建議，採用適當的間接方法，

或可使自由早日實現。」(註一四)

(三)促印發展國內教育與爭取國際同情：「我

覺得中印兩民族革命的環境，有若干不同之點。第一、印度的交通非常發達，就不容易進行武力革命，因為革命的根據地不容易建立；印度的革命黨沒有法子練兵，政府很容易出而制止，但武力革命必須有軍隊作基礎，沒有軍隊，就是得到了政權，也難於維持。第二、我知道你們現在已有不少革命的幹部人才，但一般人民的知識程度不够，將來要得更多的革命人才，一定困難。這是印度革命不易成功的原因。這二個困難若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即令得到政權，不一定要英國人挑唆回教徒或土邦王公與你們搗亂，你們也是保持不了的。然而印度也有幾個有利的條件為他國所沒有的。第一、現在全世界知識分子多同情印度獨立與自由的要求，這種同情為促成革命的最大力量。第二、現在在印度的英國政權也成強弩之末，不待別人去推翻他，他自己就會倒的。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英國在印政權，已到了自腐的境地，也許不待印度革命成功，它自會崩潰。

「印度革命的成功，我看不過是時間的問題，革命成功當然早一步好一步，早一天好一天。但在民衆力量沒有切實培養成功以前，就不易做到。此刻練軍一事，一時辦不到，但發展國內教育與爭取國際同情兩點，大可做到很好的準備。其中爭取國際同情尤其特別重要，必須做點工夫。時至今日，英國的對印態度，不能不重視美國的對印意見，這是說對外。至於對內，一定要設法普及民衆教育，提高民衆的教育程度。教育程

度提高，將來培植軍政新幹部，才有辦法。社會一般的教育程度提高，對革命就有更大的助力。

「所以我認為最好是用外交與教育兩方面來同英國鬥爭。一面乘世界大戰的機會積極參戰，與同盟國發生密切的關係，取得世界同情，將來在和平會議席間，各國自必出力幫助；一面乘英人無暇橫加阻撓的時候，發展教育，培養軍政兩方面的幹部人才，作積極的準備。我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機會，如果輕易放過，以後不知甚麼時候，再能得到。」

「我對你們完全是一種熱誠。從事革命的人而無熱誠，就不能革命。凡事出之以熱誠，這是我總理傳下來一貫的精神。我絕對不說假話。我說到的就一定做到，你們或者對於我的這種精神，還不十分了解，但英美人對於這一點却十分明白。」（註一五）

從上引蔣公談話重點，可知其對印度當時的革命環境，瞭如指掌。對印度革命方略所作具體建議，如參戰以爭取國際同情，發展教育以培訓幹部，以及先取得自治領地位，而後完全獨立等，更是高瞻遠矚，而尤其是對印度於戰後之必能獲得自由，堅信不疑，並不斷保證將會毫無保留地在戰後和會中提攜印度，更不惜以退出和會為印度爭取出席資格，這種遠大的眼光與偉大的襟懷，至情至性，衡諸近代世界政治家，實屬罕見。

但蔣公之一本至誠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為印度爭自由平等所作的努力，猶不止此。

五、向英美盟國呼籲予印度政治實權

(一) 公開呼籲英國政府予印度政治實權。甘

地、阿沙德、尼赫魯與蔣公談話時，均期盼英國能改變對印政策。甘地說：「他們措置不當，我不合作；他們措置得當，我就合作」。阿沙德說：

「英國的態度，使印度國民無法參加努力作戰，英國給我們以獨立，我們就可協助戰爭。假使我們手中無權，對戰爭也就無能為力。我們欲使印度國民得到真正的主權，而不是空洞的諾言，英國政府對這一點，並沒有甚麼表示，移交實權，必須立刻進行。」，「倘若真是真正交付實權而與自治領地位相彷彿者，則國大黨必加考慮」。印度革命領袖之渴望獲得政治實權，並以此作為支持英國作戰的先決條件，極易理解。惟就當時實際狀況言，英國以印度為其直轄殖民地，故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對德宣戰之時，未得印度殖民地政府同意，早已逕行宣佈印度亦為交戰國之一員，根本不認為印度之參戰尚有任何問題。而今大戰猶在進行，印度竟然要求英政府立即交出政治實權，即無異改變印度殖民地政府的體制，當然會遭致其強力反對。倘若盟國亦同情並支持印度的要求，亦必然引起英國的極大反感。但是就當時戰局與現實而論，誰也知道日軍的猛烈攻勢，緬印危急，勢非印度徹底動員全力支持作戰不可，而誰也知道印度之向英國要求政治實權爭取民族自由，亦完全符合盟國作戰目的，關鍵則在英國願否顧全大局，適時調整對印政策，又盟國

領袖之中，何人願為印度計，為遠東戰局計，為人類永久禍福計，不惜因此而刺激英國，能挺身而出，向英國作此公開的呼籲！蔣公蒞印聽取朝野各方意見後，乃毅然作了歷史性的決定：「吾人傳統之精神，厥為不惜犧牲自己，以達救人救世的目的」（註一六）。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加爾各答發表告別印度國民書，即特別強調：「最後，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的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更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固為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線之勝利，實亦與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關係。余以客觀地位，認此乃大不列顛帝國有益無損，且為最賢明之政策也。」（註一七）此一誠摯有力之呼籲，在二次大戰期中，出自盟國領袖之口，除蔣公外，實無第二人。以當時我居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蔣公又係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且中、印兩國更是唇齒相依，而英國又賴我派軍入緬解英軍之危，故蔣公此一震撼性之偉大號召，不僅為英國政府之所不能不予重視，而尤其是對印度與所有被壓迫正奮求自由獨立的民族，均提供了新的鼓舞與無限希望。

(二) 促請羅斯福總統主張公道，予印同情並勸導英國以非常之遠見與英斷，謀得印局之合理解決。蔣公訪印後，印局仍續惡化，乃於七月二十四日及八月十日兩次重慶電請美國羅斯福總統，運用其影響力，速採行動。其中對印度國民心理的剖析之詳與對美期盼之切，對英摯望之深，語語真切，令人感動。蔣公電文於下：

「羅斯福大總統閣下：印度局勢，雙方僵持，已達極緊張迫切之階段，其發展如何，實為我同盟國作戰，尤其在東方戰事成敗最重要之關鍵。我反侵略各國所昭示於世界之共同作戰宗旨，為打倒暴力，爭取全人類之自由，若印度竟發生反英乃至反同盟國運動，印度局勢惡化，則軸心伙伴必坐收其利，整個世界戰局固受嚴重之影響，而盟國正大之作戰宗旨，將無以取信於世人，此不僅為英國最大之不利，亦將為此次戰爭民主陣線留一甚大污點。當此時期，凡我盟國應及時有所盡力，以消弭此不幸局勢之出現。貴國實際上為此次正義戰爭之領導者，閣下之主張，又夙為英國所重視，而印度人民之熱望貴國主張公道，亦非一日。茲特以余個人所見為閣下道之。印度國民大會在此時向英方提出要求，在英國不視為乘危要挾，但就一般而論，彼等此舉，即印度國民大會常會之決議，其內容與時間固皆留有充分餘地以期待妥協也。余在前次訪印時，曾切勸印度國民參加反侵略陣線共同作戰，以爭取整個人類自由為急務。然吾人試為印度國民着想，彼之一貫目的惟在求得其國家之自由，凡爭取國家自由者之行動，無論對其自身與其對象，皆祇有感情，而絕少理智之可言。故余以為此時若用與論與軍警之壓力使之屈從，必得相反之效果，蓋由印度人民之心理觀之，其本國雖有廣大之土地與資源，然在未獲得國家自由以前，彼等並不視為印度本國之所有，惟其一無所有，故亦一無所懼，而且除要求印度獨立自由之外，其他亦一無所求於人也。印度人民今日惟一之要求祇為其

國家之自由，而所望於我盟邦者亦惟在對其國家自由之要求予以同情而已。印度國民之特性，先天的偏於消極，且易生極端，余逆料印度國民大會在此軸心侵略迫切時發生此要求自由之運動，其內心當有若干之苦痛，但若我盟邦毫不予以同情而使陷於整個之絕望，則余敢斷言，八月中國民大會開會之後，彼國局勢如任其變化則必有不可收拾之危險，如果印度內部發生反英或不幸之事變，則我東方戰局必立受其影響。現時我盟國為求取勝利，必須求得印度局勢之安定與印度人民之合作，我盟邦實有賴於印度，而印度人民則無所求於世界，彼等自視其爭取獨立自由之運動，並非在戰事起後新發生之運動，故並不考慮其是否有害於世界之大局，在民族自由運動中之一切行動，彼等實無所顧忌，此心理是否錯誤姑不具論，而彼等之心理則固如是。因此之故，彼等之今日，決非冷靜的輿論所能喚醒，亦非剖析利害所能促其覺悟。設若彼輩感覺一無和平解決之希望時，勢必鋌而走險，急不暇擇，即同歸於盡，亦所不顧。目前惟一的啓其反省之方法，惟在我盟邦，尤其為彼等夙所仰望如美國者，以第三國之資格，向之表示同情予以安慰，以冀挽回其理智，使之發生新希望。以為公道猶存，然後可使局勢由緩和而安定，而彼等衷心感激乃能使之誠意參加作戰也。否則使印人絕望且使其以對英國之感情而對我同盟各國，萬一時局到此，實為世界人類最大之悲劇，豈惟英國一國有損而已哉。就英國方面而言，英國實為大國，近年方執行其明智之屬領地政策，為反侵略戰爭中之主要國

家，而印度則為弱小民族，且現當世界空前大戰進行之中，一切自非可以常軌處置。為英國本身榮譽與真正利害計，余以為英國當用非常之勇氣與忍耐，非常之遠見與英斷，從速消弭局勢惡化之原因，免為軸心國所利用，以肆其欺騙之宣傳。否則若任令局勢遷延坐誤，待至反英運動發生後而英國仍執經常之殖民地法律以相繩，或用軍警壓力相強制，則壓力愈大，反動愈強，適以擴大騷亂與不安。無論其所得結果如何，即使印度此後非暴力運動為英國所鎮懾而平服，然而同盟國精神上之損失與打擊，必較任何戰爭失敗為尤甚。此尤英國所最不利者也。印人一部份之偏激錯誤者，以為「與其終不得自由，則英國與軸心國何擇」。此固為我盟邦所應極端排斥之謬論，然英國方面最明智之政策，則應為「寧以整個自由還印度，決不使軸心軍隊插足於印度之寸土」。若英國果能採取此種態度與精神，則印人對英之印象，必可大見改善。而且余深信印度之局勢，亦必因之改觀也。余以為此時美國應以公正之態度，勸導英印謀得合理與妥善之解決。誠以此事實於人類之福祉與盟邦之信譽有關，而其責任則莫宜於由同盟作戰領導者之美國毅然肩荷之也。全上文所言，決非危言聳聽，實為貫徹我同盟國作戰之宗旨以及共同利害關係，而不能不有所言。茲因時勢迫切，特以盟國一員之資格，密為閣下貢獻余之所見。此電並不公開於任何方面，但供閣下之參考。究應如何挽救此僵局與危機，惟望閣下詳加考量，余固不欲固執所見。惟覺我盟國對印度局勢應速定正確之方針並有所盡力，庶

幾整個戰爭不致蒙受重大之不利耳。切盼有以見教爲幸。」

(二)再電促羅斯福總統速採行動。蔣公上電發出之時，印度國大黨中常會於七月十二日在瓦爾達 Warda 已通過一項歷史性的決議，「要英國人撤出去」。其中一段提到：「本黨主張英國從印度撤出去，並無意和英國爲難，妨害聯合國正在進行之戰爭。更非鼓勵侵略者來到印度，或增加日本對中國的壓力。本黨更不想削弱盟國的防衛力量，因此本黨同意盟軍在印度駐防，倘有此需要，爲了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國」。甘地並爲此致緘蔣公：「我永遠不能忘記在加爾各答和閣下及夫人五小時的懇談。我永遠嚮往爲自由而奮鬥的閣下。而那一次的會見和談話，又使中國和中國的問題，對我更加接近。因爲我們有這樣一種對中國的感情。又由於我們懇切希望我們兩大國家彼此更爲接近，並爲彼此利益合作，所以我要向閣下說明我們要求英國政權自印度撤退，絕對沒有削弱印度抵抗日本的防務，或妨害閣下的奮鬥之意。印度決不應向任何侵略者屈服，必須加以反抗。我決不能出賣你們中國的自由，以購買我們國家的自由。無論採取甚麼行動，都必首先顧慮到不要傷害中國或者鼓勵日本侵略印度或中國」。

瓦爾達決議，於是年八月九日提經在孟買舉行的國大黨全體中央委員會，獲一致追認通過。第二天印度政府採取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方式，將甘地及國大黨全體中常委與其他高級幹部，一律拘捕。有的人來不及帶上眼鏡，有的忘記了帶

錢包，有的連換洗衣裳也不會清理，即被押上囚車，開到火車站，那裏有升火待發的火車準備起解，孟買居民尚在睡夢之中。(註一八)

甘地等被捕新聞傳至重慶，蔣公乃於八月十日急電羅斯福總統，防從速挽救。電文如下：「羅斯福大總統閣下：印度國大黨領袖甘地及尼赫魯等中常委，已被逮捕，余前次致電閣下所最杞憂者，不幸竟成事實，殊屬痛心。此事對我盟邦在東方之戰局，實爲重大之打擊。對未來整個局勢實蒙最不利之影響。如任其發展，則我盟國之作戰宗旨，無以見信於世界，在精神上即無異爲軸心之德日張其聲勢。若不從速挽救，則我同盟國作戰之宗旨已失，即使最後獲得勝利，亦等於失敗。蓋世人將識我盟邦不能實踐我解放人類爭取自由之作戰宗旨，而相反的有壓迫自由之事實。余迫切向閣下呼籲，請閣下出而主持正義，以緩和印度之局勢，而使之歸於安定。閣下爲我民主盟邦之領袖國家，閣下又爲二十八國所擁護之大西洋憲章之發起人，值此人心激盪於一髮之時，敢祈速定方針，有所指示。特電閣，並候惠覆。」(註一九)

蔣公兩電羅斯福總統請其力挽危局，義正辭嚴，大中正，且極切合需要。惟羅斯福總統認爲蔣公的建議，將「減損印度政府的威權」，故以「不採取蔣公建議的舉動，較爲明智」，而「我等實無道德上的權力，強迫英國或國大黨，而僅能站在整個友誼立場上，如爲雙方所邀請，自當樂爲協助」。可見美國所考慮者，仍係以英美「血濃於水」的立場，祇重視英國在印度的威權

，將英國利益置於印度奮求自由獨立的願望之上。(註二〇)

(四)邱吉爾首相對蔣公建議的反應。蔣公於是年八月十一日致電羅斯福總統請速採行動，調停英印關係之同日，並在重慶約見英國駐華大使薛穆 (Sir Horace Seymour)，表示我對印局惡化之嚴重關切，並盼英能速謀挽救。邱吉爾首相接獲薛穆大使晉謁蔣公之談話報告後，於八月三十一日致緘蔣公，力陳甘地所領導的國大黨決不能代表整個印度，且指甘地正準備與日人談判，准許日軍假道印度與德軍會師，而日則助甘地建立武裝部隊，以便建立統治印度之政權；更表示願採取行動，維護滇緬公路之安全，以減輕日軍對我進攻之威脅。邱吉爾首相指甘地欲借助日軍使人相信；而所謂將助我維護滇緬公路安全一節，更使人想起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我對外交通幾陷於完全中斷之時，英竟同意封鎖彼時我唯一通往海外之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三個月，以便利日本之早日結束在華戰爭，佔領中國。其自欺欺人不誠無物之言辭，何能服人？邱吉爾首相來緘的重點，則爲完全拒絕蔣公所作的明智呼籲。「閣下倘被牽涉與現正破壞印度政府戰事工作及此廣大區域之和平秩序之國大黨或個人，爲政治之通訊，鄙人深以爲憾。鄙人深恐如此事件發生，做國有力之輿論，對於閣下或將發生隔閡。覺得做國對德義日之戰事負擔，反爲吾人久尊爲英雄與朋友之人所增加。至閣下建議英政府應接受美總統調停關於英政府與印度大黨及印度關係

一節，本人茲正式聲明，任何英國政府，由余為領袖或閣員時，決不接受此項影響英皇陛下主權之調停。鄙人對於美國總統熱忱之友誼與欽佩，及吾二人以最親密之地位對於全盤政局共同工作，當為閣下所知悉。鄙人深信美總統決不願向鄙人作此建議，蓋彼熟知鄙人對於英皇及國會責任之信念也。」

「I should therefore greatly regret if your Excellency were to be drawn into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with Congress or with individuals who are endeavoring to paralyse the war eff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o unsettle the internal peace and order of these vast regions. I am afraid that such an incident would lead to estrangement from your Excellency of powerful sections of British opinion who would naturally feel our war burden against Germany, Italy and Japan had been increased by one whom we have long regarded as a hero and a friend.

With regard to the suggestion which your Excellency has made tha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should accept medi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their relations with Idian Congress and generally with India. I should like to place on record the fact that no British Government of which I am the head or

member will ever be prepared to accept such mediation on a matter affecting the sovereign right of His Majesty the King-Emperor. I have as your Excellency knows the warmest feelings of friendship and admiration for the president and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he whole field of war in the closest comradeship. I am sure he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make such proposal to me because he is very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conviction I have about my duty to the crown and parliament" (註一一)

邱吉爾首相的來緘，蔣公閱悉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國對印度應有堅定之政策，而不為勢利與虛聲所轉移。此不惟對英為然，以後對國際態勢，皆應以克己與自立為本。彼以其利，我以其義，彼以其力，我以其理應之。使歐美人士，知我民族道義精神之所在，而漸改其輕視中華之心也」。(註一二)

六、結語

蔣公在與甘地會談中，曾預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之失敗，乃一定趨勢」，又預判「此次戰爭或尚有兩三年之持續，但間或發生新的變動，半載一年即可結束」。會談時間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而一年後義大利果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盟軍投降，德國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為盟軍所佔領，恰為三年。日本限着於九月也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蔣公之料事如神，於斯

可見。此次大戰以反侵略，爭自由，為人類的正義與真理而戰，而西方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統治，完全與大戰所揭發的精神背道而馳，其必然於戰後被民族自由獨立的力量所推翻，實為莫之能禦的時代洪流。任憑邱吉爾首相如何老謀深算，却也敵不過戰後民族主義潮流的洶湧澎湃。他在致蔣公的信緘裏，曾強調聲稱，由他為領袖或閣員的任何英國政府，決不接受蔣公對處理印度問題的建議，曾幾何時，歐洲戰區於五月纜停戰，六月英國國會即行改選，將他們的戰時英雄遠遠的拋棄了。邱吉爾所領導的保守黨慘敗，工黨執政。邱吉爾不再是英國政府的首相，也不再是閣員，而新政府的印度政策，也完全改弦更張：一九四六年九月尼赫魯所領導的印度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國艾德里首相宣佈將政權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前交還印度；八月十五日印度由殖民地正式成為自治領；一九四九年四月更經由不列顛聯邦首相會議的決定，認可印度的獨立地位，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乃正式宣佈為獨立民主共和國。由政治實權的取得，繼而成為自治領，最後完成獨立，此一程序的進行，正是蔣公於一九四二年向甘地等革命領袖所建議。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印度剛宣佈成立臨時政府尚未取得政治實權成為自治領之前，蔣公即指示將我駐印專員公署升格為大使館，亦即等於給印度臨時政府以法律承認，以提攜其國際地位。一九四七年二月並宣佈派羅家倫博士為我首任駐印大使，五月十六日羅大使呈遞國書，是為世界駐印大使之第一人，即為駐印外交團之當

然主席。以當時我在國際間的地位，除四強之外，多唯我「馬首是瞻」，其在外交上所予印度之支持，可謂無出其右。

印度臨時政府成立之日，我駐印大使羅家倫博士曾寫詩一首與印度政府，尼赫魯並親筆復謝：「謝謝閣下為印度而高歌的詩章；余甚珍愛此詩，詩句優美，更愛你用那清麗的詩章，宣洩出來的微妙情感。閣下將中華民國人民美妙的精神，對印度人民真摯的情感，用簡短的詩句表達無遺。請接受我最誠懇的謝意。閣下的全詩已送給我們的宣傳部，印發各報，將於明（八月十五）日刊出。」

羅家倫博士詩如下：

「印度會自由！」

這不是

一個喜馬拉雅山頭的夢？

是多麼荒謬，

多麼可笑的思想，

從來也不曾到過我心頭！

四十年前，

有年紀的人們談起來，

都能意見相投。

「自由」應當是最後的目標，

一個文弱的聲音低低地在耳邊呼喚：

這聲音最先發自一個偉大的靈魂，

他據有的只是一個渺小的軀幹。

開始只像一線微弱的波紋，

最後却掀起整個印度洋巨浪奔騰！

宛似印度洋後浪驅前浪，

民族願望是這般無際的飛揚，

陶醉在自由的精神裏，

集合一切革命的力量，

徒然地不可認識的智慧獲得了勝利，

在智慧裏東方與西方，

聚首在共同的立場，

好一個奇蹟，

獨立而用不着戰爭，

歷史會告訴你，

那曾有過這樣的事情，

站在時代巨輪上的御者，

提高勇氣向前，

加倍你的努力，

當你正要逼近山嶺，

崇高、美麗、尊貴、莊嚴。

本文之所以將羅詩及尼赫魯復謝信，錄作結語，乃欲更證明蔣公及所有中國人民對印度的自由與獨立，的確是一貫的支持，由衷的祝福。

附註

註一一：拙著：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一九五頁。

註一二：陽明書屋專檔：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

邱吉爾首相致蔣委員長電。“We think

here in cabinet that your sugges-

ted visit to Mr. Gandhi at Wa-

rdha might impede the desire we

have for rallying all India to the war effort against Japan. It might well have unintended effect of emphasizing communal differences at a moment when unity is imperative and I venture to hope that your Excellency will be so very kind as not to press the matter contrary to the wishes of the viceroy of the King Emperor”

註一三：蔣公訪印紀要，附錄：蔣委員長會晤甘地談話紀錄，台北陽明書屋。

註一四：蔣公訪印紀要，附錄：蔣委員長接見印度國大黨主席阿沙德談話紀錄（三十一、二、十一）台北陽明書屋。

註一五：蔣公訪印紀要，附錄：蔣委員長接見印度國大黨中常委尼赫魯談話紀錄。（三十一、二、十二）台北陽明書屋。

註一六：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蔣公告別印度國民書。

註一七：同上。

註一八：拙著：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二一五頁

註一九：蔣公訪印紀要，附錄：蔣委員長致羅羅斯

福總統電。台北陽明書屋。

註二〇：同上，羅斯福總統復電。

註二一：同上，邱吉爾首相致蔣公誠。

註二二：蔣公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日記。陽明書屋專檔。

——（全文完）